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丛书

江冰 胡颖峰 著

浪漫与悲凉的人生



传统文化与现文化丛书

江冰 胡颖峰 著

浪漫与悲凉的人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56 号

浪漫与悲凉的人生

江冰 胡颖峰 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发行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39 号 邮码 100872)

印刷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经销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787×1092 毫米 32 开

字 数：163 000

印 张：7.25 插页 2

版 次：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册 数：1—3 000

书 号：ISBN7-300-01861-0/G·264

定 价：4.80 元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丛书”序

文化，是当今人们普遍关注并展开论争的一个热点。

人类面对着由其“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所决定的文化环境。文化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又反过来制约着人类的行为。人类生存、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创造文化、选择文化的过程。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地关心自己的生存与发展；作为个体的人，伴随着“自意识”的觉醒，也愈来愈关心自己的行为。因此，人们以空前的热诚来思考和探索文化问题。

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20 世纪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迅速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冲开了民族壁垒，打破了人们封闭的心态和狭窄的视野；改革的潮流，在世界各地掀起；社会主义中国，正在进行着深刻、宏伟的改革实践，中华民族进入了伟大的振兴时代。社会的变革，不可避免地反映到文化问题上来。一方面，变革必然要求人们进行观念形态的转变，思维方式的转换，行为模式的转化，一句话，我们的时代要求有与改革相适应的新文化。另一方面，在人类社会形成的过程中历史地产生出来、作为传统留存下来的文化，既有与改革相适应的成分，也有与改革相抵牾的因素。于是，便引发出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与交融。在这里，存在着文化的稳定

性与可变性、继承与革新的辩证关系。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吸取与借鉴各国、各民族的有益的文化成分，建构现代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借以推进我们的改革、开放，加速实现我国的现代化，是伟大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为了探究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追寻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点，我们编辑出版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丛书。丛书的选题，或以宏观的视野，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沟通、冲突、结合，作纵向与横向的探索；或以微观的视角，从某个侧面例如人生成长、人际关系、两性关系、民族性格、民俗民风、婚姻家庭、人才开发、思维方式等等，来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与结合问题。

丛书力求联系现代化建设时期的社会实际，通过学术性的探讨，能在一定程度上回答现实生活所提出的问题。同时，也力求做到学术性、知识性与可读性的有机结合，使之适合于高中文化程度以上的广大读者阅读。

丛书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撰稿人大胆进行探索，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

“人、文化、社会”是一个整体，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在这个系统之中，文化无所不在，谁也离不开文化。我们期待广大读者，同我们一起来思考与探索文化问题。我们希望这套丛书得到你的喜爱，于你热诚地思索文化问题有所启迪！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丛书”编委会

1988年6月15日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编：张立文、周文柏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汤群英、张立文、李力新、

李甦平、周文柏、唐合俭、

秦桂英

目 录

第一章 文人的沉浮衰荣.....	1
一、先秦游士：文人之先驱.....	1
二、秦汉儒生	11
三、从魏晋时代的“啸”谈起	20
四、盛唐之音：一个时代的终结	29
五、重文轻武与精神衰微	38
六、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46
七、最是荡涤放情志	54
八、末世的朴学之士	64
第二章 生存依赖与功名追逐	71
一、冯谖的“食无鱼”与生存依附性	71
二、功名成就的理想	76
三、科举制的召唤	84
四、幕府：文人的另一条道路	89
五、终南捷径	93
第三章 闲适人生与生活智慧	97
一、情系山水	97
二、琴棋书画寓真情.....	102
三、清茗悠韵.....	107

四、醉翁之意不在酒.....	110
五、却道天凉好个秋.....	114
第四章 新世纪的崛起.....	124
一、亚细亚的美梦.....	124
二、睁眼看世界.....	127
三、从“家”里出走.....	130
四、狂飚突进的精神.....	135
五、认识“人”，寻找“人”.....	140
六、新学堂、新学生、新人才.....	144
第五章 文明的对峙.....	151
一、一个颇有意味的文学现象.....	151
二、原型的出现.....	155
三、神圣的工农者原型.....	158
四、自卑的知识者原型.....	159
五、传统文化心理的制约.....	161
六、颜回精神与苦行僧模式.....	164
七、衣带渐宽终不悔.....	168
第六章 凤凰涅槃.....	178
一、形象的沉沦.....	178
二、西绪福斯的苦役.....	186
三、神圣的蒙难者.....	189
四、殊途同归：走向祭坛.....	193
五、从自恋到自审.....	195
六、《白涡》：本文分析的结论.....	208
七、拷问自我：灵魂的搏斗.....	213
八、走出生存困境.....	218

并非结语：关于中国知识分子性格批判的断想·····	224
后 记·····	235

第一章 文人的沉浮衰荣

一、先秦游士：文人之先驱

从公元前 770 年始，至公元前 221 年止，其间 550 年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春秋战国时期。

这段遥远的历史给今人留下的深刻印象，除了天下大乱、群雄争霸局面之外，就是士气高涨、百家争鸣的风气了。在这页历史大书的字里行间，浮现着一个个“士”的生动形象：孔子、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以及他们的一大批门生弟子和追随者，他们在社会舞台上的精采表演为这段历史增添了无比的光彩，而历史又反过来使他们的精神化作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一个悠远的回声。

士，中国知识阶层崛起的标志。

士，中国文人的先驱。

然而，士在远古并非属于知识阶层，他既不等于读书人，更不是后来的所谓文人、文士或者士大夫。士之身分的独立与自觉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根据商、周时代的文献判断，当时的“乡士”、“庶士”等称谓有可能指“知书识礼”的贵族阶层，或者是泛指各部门掌管事务的中下层官吏。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士的这种情形才开始发生变化。现代学者顾颉刚先生曾经对此做过分析，试图寻找士之身分变化的

历史原因：

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故谓之“国士”以示其地位之高。……谓之“君子”与“都君子”者，犹曰“国士”，所以表示其贵族之身分，为当时一般人所仰望者也。……

儒家以孔子为宗主，今试就孔子家庭及其门弟子言之……足见其时士皆有勇，国有戎事则奋身而起，不避危难，文、武人才初未尝界而为二也。

自孔子歿，门弟子辗转相传，渐倾向于内心之修养而不以习武事为急，浸假而羞言戎兵，浸假而惟尚外表。……以与春秋之士较，画然自成一格局，是可以覩士风之丕变矣。……

讲内心修养者不能以其修养解决生计，故大部分人皆趋重于知识、能力之获得，盖战国时有才之平民皆得自呈其能于列国君、相，知识既丰，更加以无碍之辩才，则白衣可以立取公卿。公卿纵难得，显者之门客则必可期也……宁越不务农，苏秦不务工、商，而惟以读书为专业，揣摩为手腕，取尊荣为目标，有此等人出，其名曰“士”，与昔人同；其事在口舌，与昔人异，于是武士乃蜕化而为文士。

然战国者，攻伐最剧烈之时代也，不但不能废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故士之好武者正复不少。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

为二。^①

从顾颉刚先生的见解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文士”的出现正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产物，是适应那个大变革时代需要而产生的。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奴隶制瓦解和封建生产关系萌生并逐步确立的时期。随着王室力量的衰微，周朝天子一统天下的局面被各诸侯国争霸的形势所替代，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分封制也逐渐被以国王为中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所替代。为了博得宠妃褒姒一笑，不惜点燃烽火戏弄诸侯的周幽王，以他的死亡结束了西周王朝。周平王被迫东迁，开始了历史上的东周时期。此时的周天子，虽然还在名义上保存“天下君主”的地位，但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号令天下的权势和威望。各国诸侯一面对天子或公开对抗，或阳奉阴违，或采用各种手段以获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一面各自加紧富国强兵、扩充势力，以达到争霸天下的目的。当时的郑、齐、宋、晋、秦、楚、吴、越等诸侯国都曾相继称霸于中原。诸侯的目的说穿了就是一片，安邦治国从而夺取天下。为了夺取天下，必须拥有威震四方的军事势力，而军事势力的壮大与军事行动的成功，依靠两个方面：富国强兵的政策与向外势力扩张的谋略。这样，光靠勇士冲锋陷阵杀场拼搏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靠谋士，就好比三国时的刘备，即使拥有五虎上将，而无诸葛亮挂帅，仍然是群龙无首一般，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在诸侯争霸时期，可以

^① 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蜕化》，《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85—91页。

称作“一士难求”，这里的“士”，自然主要是指有韬略的谋士。春秋五霸之首，齐国国君齐桓公重用管仲从而成就霸业的故事就是一例。

齐襄公死于国内兵乱后，齐国一时出现君位空缺的局面。当时，为了避开国内兵祸，襄公弟公子小白在鲍叔牙的辅佐下逃往莒国，襄公弟公子纠在管仲的辅佐下逃往鲁国。管仲和鲍叔牙是多年的好朋友，但是现在都只想辅佐自己的主子夺得齐国国君的位置。这时，齐国的大贵族国氏和高氏派人去莒国，通知公子小白迅速回国，准备扶他为王；而鲁国也派军队护送公子纠回国继承王位，并派管仲率领一支人马来莒国通往齐国的路上守候，阻挡公子小白回国。管仲赶到莒国的边境时，恰好撞见公子小白和鲍叔牙等一行回国的人马，管仲见状万分焦急，唯恐对方先行回国，便突然向公子小白射了一箭，箭中小白衣服的带钩，没有伤着身体。小白却将计就计，惨叫一声，假装中箭倒下，管仲以为小白已经丧命，立即报讯回去。鲁国得到消息后，认为已经没有了争夺君位的对手，送公子纠回国的队伍也就走得慢了下来。相反，公子小白和鲍叔牙一行却日夜兼程赶回齐国首都临淄，在国氏、高氏等人的扶助下登上君位，成为齐桓公。齐桓公即位后，立刻派军队打败鲁军，鲍叔牙送信给鲁国说：“公子纠是我们国君的兄弟，国君不忍亲自杀他，请鲁国杀掉他；管仲和召忽是齐国国君的仇人，齐国国君要亲自杀掉他才解恨，请把她们送回，否则，齐军就要包围鲁国。”鲁国迫于形势，只得杀了公子纠，把管仲押在囚车里送回齐国。

齐桓公为报一箭之仇，本想杀掉管仲，但鲍叔牙劝他说：“君王应该把眼光放得远大一点。如果大王只想治理好一个齐

国，那么我和国氏、高氏来协助您也就够了。如果大王想称霸诸侯，就非管仲不可。管仲的才能比我高多了，大王如果重用他，他一定能使齐国成就一番大事业。”齐桓公接受了鲍叔牙的意见，拜管仲为相国，地位在鲍叔牙之上。管仲为此感叹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后来，管仲果然大有作为，辅佐齐桓公登上了霸主的位置。以至于连孔子都赞叹不已地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

引起我们兴趣的是管仲的低贱出身，他是以一个贫寒之士的身分，凭借自己的才华当上大国的相国。贫寒之士事业成功的可能性与国王君主求贤若渴的心情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社会发展需要。因为在西周春秋时期，实行的是世官世禄制，天子、诸侯、卿和大夫、士之间有严密的宗法血缘关系，官位是世袭的，出身贫寒的贱士没有当官执政的可能，这种现象到了春秋末期，由于旧的宗法秩序的动摇，出身低贱的新兴的士阶层参与了政治，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士的崛起既是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特色，也是适应大变革的时代潮流应运而生的。

大概也是“上有好者，下必兴焉”的缘故吧，掌权者的重视也推动了士阶层的活跃。各国诸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不但一反原有的注重宗法血缘关系的观念，大胆提拔重用与他们没有宗法血缘关系的贤士，而且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一时形成了“国君养贤”的风气。

重用管仲而图霸天下的齐国君主在重视和使用士的方面似乎是有传统的。据《齐语》记载：齐桓公手下有游士80人，

齐桓公供给他们车马衣裘和大量的钱币，让他们周游四方，用以号召天下贤士。^①这里显然是为了扩大政治影响。齐桓公是公元前 685 年开始执政，在位 43 年。200 年后，齐宣公即位，依然是遵循祖先的方式，如法炮制。他对孟子的态度就很可能说明问题：

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孟子·公孙丑》下）

这是孟子辞去齐国的官职，回乡后，齐王托大臣转告孟子的话。他之所以想在临淄城中给孟子一幢房屋，用万钟之粟来养活他的门徒的条件挽留孟子，目的就在于让齐国的官吏和人民都有所效法。可见齐王认识到孟子在政治上的号召作用。明白了这一层关系，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 4 世纪中叶齐国之稷下之学士兴起的历史原因了。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对此也有记载：

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予、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于是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

^① 参见顾炎武：《日知录集释》（万有文库本）卷七第三册，第 51—52 页。

齐宣王是一位胸有大志、颇有作为的君主，在他之后，公元前 288 年齐湣王和秦昭王并称东、西帝时，齐国国力之强盛也有赖于齐宣王所开创的事业基础。齐宣王为了实现图霸的目标，清楚地认识到战国新兴的士所具有的知识和影响的政治价值，竭力以十分优厚的生活条件和政治待遇来争取士的支持，甚至可以容忍“稷下先生”以“不仕”、“不宦”，即不以臣属的身分而享受大夫的待遇，所以宽容到这样的地步，无非是因为当时天下形势的需要。

对此，美籍华裔学者余英时曾经作出这样的评价：

但在公元前 4 世纪中叶到前 3 世纪中叶这 100 年之内，知识界的领导人物都受到战国王侯的特殊礼遇。他们既不用向王侯臣服，也毋需为生活担忧。不但如此，他们的议政自由还受到制度化的保障。事实上，他们的主要职责便是“议政事”。在这种情况下，古代士的功能已发挥到最大可能的限度。稷下学官虽昙花一现，但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则是永恒的。因为议论的自由同时也刺激了思想学史的成长。先秦所谓“百家争鸣”的时代主要是和稷下时代相重叠的。在这个时代中，不但齐国尊贤，其他各国也莫不如此，但不及稷下之著名而已。^①

余英时先生的精辟见解已道出时代氛围与精神气候对士崛起的重大作用，而一言以蔽之，正是时代之使然。

时代与社会的需要，也促使一些平民通过“士”的渠道

①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6 页。

去求生存，求上进，求个人功名，求自我实现。到了春秋末期，平民庶人努力通过读书、走学术道路，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吕氏春秋·尊师》篇载：

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曲，学于子墨子；索虏参，东方之巨狡也，学于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墨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于学也。

从这段史料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像上述这些鸡鸣狗盗之徒，刑戮死辱之人，之所以成为名士墨人，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既然受到贵族的礼待，大概生活也不至于太差），全在于他们拜师之后，有了学问。学问如此值钱，读书如此有用，自然对平民庶人有很大的诱惑力。《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就这样写到：“中章，胥己住，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史料中有中牟之民的具体事迹可为例证：

宁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劳。谓其友曰：“何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学。学，三十岁则可以达矣。”宁越曰：“请以十岁。人将休，吾将不敢休；人将卧，吾将不敢卧。”十五岁而周威公事之。（《吕氏春秋》卷二十四）

宁越弃农从文，以读书求仕进，并最终成功，也说明了当时读书人从文而非练功习武在社会上地位的提高。世袭贵族的逐渐没落，无疑也为平民庶人开通了一条“学而优则仕”的上进道路。